



日本：
我心中的花朵与伤疤

胡澎 著





日本：
我心中的花朵与伤疤

胡澎 著

Simplified Copyright ©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我心中的花朵与伤疤 / 胡澎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2

ISBN 978-7-108-03822-7

I . ①日… II . ①胡… III .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9458 号

责任编辑 叶 彤

装帧设计 朴 实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11年12月北京第1版

201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0.125

字 数 242千字

印 数 0,001—4,000册

定 价 38.00元

序

刘德有

在甘家口天意市场附近的一家茶馆，与胡澎同志品茗闲聊，听她饶有兴趣地讲述当年留学日本时的见闻，又匆匆拜读了她写的几篇随笔，知道她正在筹划完成一本书。想来，那是几年前的事了。最近，听说她已经完稿，趁着即将付梓问世之际，送来了打印好的全部文稿，使我有幸先睹为快。

我与胡澎同志是忘年交。套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她是 60 后出生，读大学时本是学中文的。九十年代，她曾留学日本，专攻东洋文化专业，获硕士学位。2004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专门从事日本妇女问题的研究。

接到书稿，通读后我觉得，如果几年前胡澎同志出版的《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是一部学术著作的话，那么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则是一部“随笔集”，也是一部作者在日本生活的生动记录。据我所知，作者曾是一位文学少女，又具诗人气质，因此她的随笔风采多姿、物我相生、情景交融，不消说篇篇都渗透着作者的情怀。然而，本书汇集的这些随笔不是一般意义的随笔，而是有学术含量和理性思考的随笔。作者本人把它们称作“学术随

笔”。如果作者不是曾经在日本生活、学习过多年，有着丰富的亲历感受和体验，如果作者不是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我想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真实、生动、细腻，有深度、有分析，既充满感情，又富有哲理思考的随笔来。

作者为本书取名《日本：我心中的花朵与伤疤》，我觉得很耐人寻味。它不仅高度概括了全书的内容，而且更反映出作者对她的研究对象——日本的深刻认识和她对日本民族的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作者说，她初识日本是从少女时代翻阅父亲几度出访日本时所拍摄的照片开始的，她看到古朴典雅的日本庭院、历史悠久的名刹古寺、闹市街道上的汉字招牌、悬挂着灯笼的幽静小巷……每一张照片都透着“一种东方古国的神韵”，“梦想有一天能去亲眼看一看这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大学毕业后她实现了这一梦想，在日本同普通民众接触后，深感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沉甸甸的友情”。然而，她又时时陷于一种迷惑：尽管她未曾经历过那场战争，“但看到日本国旗，心中不免会联想到长达十四年的中华民族的抗战史，想到为挽救民族危亡而牺牲的英烈，想起南京城外被鲜血染红的河流”，想起被“七三一”部队惨无人道地“用作人体实验，最终被夺去生命的同胞”，想起日本某些为政者为当年日本侵略所编造的一整套开脱罪行的所谓“理论”，使她“有时很难相信历史照片上手执军刀的日本军人”与她认识的“那些彬彬有礼，谦逊、内敛、感情细腻的日本人”是否是同一个民族？作者说：在她的心中，“日本不仅仅意味着美丽的花朵，还意味着一道道深深的伤疤。这伤疤是刻在中国历史上一段屈辱的印记，是中华民族心灵上永远的伤痛”。这就使作者面对日本，面对日本民族时，感情“似乎一直在花朵与伤疤之间徘徊游离”，而且“矛盾重重”。

本书集纳的文章涉及了当代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

人民生活等方方面面，其中还特别设立了一章，专谈日本妇女问题。概括起来，本书似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曰“新”。作者根据亲身经历，写出了近二十年来日本发生的变化，而没有依据旧材料“炒冷饭”。我本人在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曾作为常驻记者在日本生活了近十五年。当时日本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国民总生产规模越来越大，1968年竟超过西德，一跃而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尽管那时日本社会各种问题层出不穷，但人们深感中国跟日本相比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差距甚大。然而，今非昔比。一方面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从此一蹶不振；而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正逐步缩小着与日本的差距，“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特别是北京、上海等某些地方的现代化程度让一些日本人失去了优越感，甚至产生妒意”。本书反映的正是泡沫经济破灭后给日本带来的新变化：经济进入长期低迷期，失业率增高，少子老龄化问题和教育等问题凸显。这一切都给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人们的观念带来了种种新变化。例如，日本人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日本年轻人消费观念变化，家族制度面临危机，离婚率增加，妇女思想意识出现新情况，等等。以女性的择偶观为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经济蒸蒸日上时，日本女性理想的结婚对象是“三高男士”，“三高”即学历高、工资高、身材高。现在却发生了变化，日本女性变得更喜欢“三低男性”，“三低”即低姿态、低依赖、低风险，换言之，就是要为人谦和，会尊重、关心体贴女性，经济自立，能做家务，不束缚对方，有一定稳定职业的男子。其结果是，性格温柔、体贴女人的男人比较受欢迎，而那种粗狂的大丈夫式的男人越来越不受日本女人的喜爱。我们从书中看到的，正是日本的这些新情况、新变化以及作者的新观

察、新思维。

二曰“真”。全书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作者坚持说真话，说心里话。在分析日本社会时，本书既充分肯定了日本社会正义的健康力量在保卫世界和平、维护和平宪法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但完全没有回避这二十年来日本人的心态随着国际形势的剧变和日本经济的衰退而发生的明显变化，指出一些人在二十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因生活优裕而产生一种以亚洲“优生”自居的“优越感”，而如今开始失去自信，甚至产生“焦虑和绝望”，遂使日本社会的民族主义思潮抬头，逐渐右倾化的倾向。

作者在书中甚至触及了日本社会的“耻部”，不仅介绍了东京等日本大城市的繁华景象，也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那些不幸者——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给予了同情。当你踏进东京这个花花世界时，目睹的是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川流不息的汽车行列，光怪陆离的霓虹灯，五光十色的广告牌，鳞次栉比的酒吧间和跳舞厅……但推开这些“华美”的帷幔，展现在眼前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日本全国有近三万人的所谓“路上生活者”。他们当中有的是从农村来到大城市闯荡，沦落为流浪汉的；有的原先是企业员工，由于经济不景气被裁员，流浪街头的；还有的因疾病、伤残、年高，丧失工作能力，有家不归或有家难归的。作者指出：“他们当中也不乏有知识有技术的人才，也有曾辉煌一时后因事业失败、欠下巨债而一败涂地者。他们是高速旋转的现代化社会的齿轮甩出去的一批人。”由此，我想起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在日本做记者时看到流浪在东京上野、新宿等闹市区或公园的那些衣衫褴褛的失业者，我也采访过东京“山谷”的贫民区，看到在那里过着悲惨生活的散工和失业者，他们住着狭窄而简陋的“简易宿泊所”，从事着重体力劳动，还要到“血液银行”出卖自己的血，勉强度日。这是四五十年前我在东京

的见闻，但今天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也许这就是日本不变的那一部分。

毋庸讳言，我们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尚存在着差距，为此作者在书中主张宜汲取日本的长处和成功经验，这一点表现了她的坦诚和率真。书中在介绍日本的城市改造经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伴随着日本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大量地方人口向大城市移动，出现了地方人口稀少、中小城镇和农村日渐衰退的局面。同时在大拆大建的城市化开发过程中，不仅出现了严重的公害问题，那些有着厚重历史文化的建筑物、历史街区也濒临被拆毁的危机。因此，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市民关心的不再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各种名义的‘开发’，而是生活质量的提高。”“在城市改造过程中，如何使之既保持历史所赋予的厚重又散发出时代的气息，既让老年人能缅怀、抚摸到过去，又能让年轻人在时尚的空间释放激情与浪漫？”这些发自心底的呼吁，催人深思，也给人以启迪。

三曰“深”。我发现本书之所以写得有深度，有理性思考，不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除了观察问题深刻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者能从文化的角度切进问题的核心。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或社会问题都可以纳入到广义的文化里来理解和把握。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了存在于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之根底中的文化内涵，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些问题本身。作者面对日本时，不仅从政治、经济、历史、国际关系、日本的走向等角度进行观察、研究，而且还重视从文化的范畴、文化传统、价值观、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进行深入探索。这就是说，作者不仅研究日本人的外部行为，更分析了深藏于这些行为中的思考方法，即文化根源。这就是为什么作者能触及深层次的问题，能达到深入的目的。书中的《吃茶去》、《散发浓郁市井气息的“屋台”》、

《爱上“居酒屋”》、《一点小意思，请笑纳》等文化韵味浓郁的篇章，读后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日本人的美学意识，从而也可以了解中日间的文化差异。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本书在这时与读者见面，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中日关系。

战后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应当说凝聚了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掘井人”的心血。对于如此得来不易的中日友好的果实，两国人民有千条理由万条理由去加倍地爱护和珍惜，而没有一条理由去损害它。中日互为邻国，中方一贯重视发展同日本的关系，而且认为搞好中日关系是双方的明智选择。然而，我们应当如实地看到中日关系存在着脆弱性和充满变数的一面。我们希望日方能同中方一道，共同维护两国大局。唯有维护和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才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日两国需要的是和平、友好、合作、共赢，而不是不合作、不友好、反目和敌对。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发展战略互惠关系，才能继续推动中日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这对两国人民有利，也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追求。说到战略互惠关系，应当说两国青少年交流才是最具有战略性的措施，也是开辟中日友好未来的重要途径。我们需要以更宽广的视野，长远的眼光，有效的方式，加强两国青少年交流，不断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培育新生力量，注入新的活力。大力培养中日友好事业的接班人，是当务之急。中日双方都需要培养一批能像老一辈那样在发展中日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经得起风雨考验的友好人士。这样，中日友好事业才能真正做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与此同时，我们要教育两国青年自觉地维护两国关系的大局，不断深化和推进青年交流，以增强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后续动力。这

是两国人民实现世代友好的共同愿望。

在中日青少年交流中，“民宿”的效果极佳，是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作者在《中日友好从青少年开始》一文中介绍了她家在2009年秋迎来日本岐阜县的一位高中女生高岛优季，通过“民宿”，与她女儿晴晴友好交流的成功经验。作者写道：两个花季少女没有任何历史的重负，她们“借助简单的英文，在音乐、电影、动画和汉字之间找到了心灵的契合点。两天后的清晨，我们把优季送到她们集合的饭店，交还给了她的带队老师。我们和她道别的时候，小姑娘眼睛中含着热泪。我们走了很远，她还在朝我们用力地挥手”。

我本人也有类似的体验。1989年，当时我的次子就读的中学与日本学校开展交流活动。那一年我家也迎来了两名日本中学生。不消说，那个年代北京的居住条件不如日本，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民宿”，学生不仅可以学习语言，而且通过与不同国度的学生的爸爸、妈妈一起生活、接触，可以了解不同的生活习惯、风俗、历史和不同的文化，可以建立起温馨的人际关系，可以结交朋友，而这一切通过书本是绝对学不到的。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暂时离开父母，既有乐也有苦，但可以培养他们的独立生活能力，可以培养判断和处理事务的能力，能够提高他们的自信心；他们暂时离开一段自己的国家，接触异文化，反而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国家。我认为，这种人生经历十分宝贵，终生受用，毕生难忘。

说到青少年交流，作者还在《自序》中现身说法做了一段生动的描述：2000年夏，作者留学日本时曾受到其关照的“日本妈妈”带着两个孙女来北京旅游。其中一个孙女恰巧与作者女儿生在同一年，而且名字里都有一个“晴”字。在北京的四天，三个女孩“虽然有语言的隔阂，但芭比娃娃、日本动画片以及儿童的纯真善

良使她们由陌生到熟悉。看着她们在一起玩儿时的快乐样子，听着她们清脆的笑声，我的内心充满感动。真心希望她们长大以后，心灵上不再有横亘在中日两国历史上的阴影，她们会真心喜欢对方国家，不像我这样一直在花朵和伤疤之间徘徊和矛盾。我也深深祈祷未来中国和日本的天空上不再有战争的阴霾，而是一片和平与友好的万里晴空”。

作者嘱我为本书写序。我实在是惶恐不安，但却之不恭，便信手写了上面一些话。请恕我以此塞责吧。

2011年3月15日于北京林萃公寓

自序

日本：我心中的花朵与伤疤

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从2002年开始，每两年进行一次规模较大的中日舆论调查。这是一份关于中国人如何认识日本的调查问卷，其中，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亲近感一直被作为历次问卷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有一次，我们研究所的人员除承担到全国各地发放三千多份问卷的任务外，还被作为特殊调查对象，每人填写了这份问卷。调查问卷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对日本民族是否抱有亲近感？”答案有“非常亲近”、“亲近”、“一般”、“不亲近”、“很不亲近”、“不清楚、不回答”。这看似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而我的笔在几个答案之间踌躇犹豫。一时间，那些关于日本的记忆、了解、认知，如无数碎片在脑海中上下翻飞，我不得不面对这个我一直不敢也不愿正视的问题，开始梳理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民族以及我所熟悉的日本人、我所生活过的城市的复杂而又矛盾的情感。

回溯最初对日本产生浓厚兴趣和渴望了解的时候，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时我正在读高中，中日关系正处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被称之为“蜜月期”的良性发展时期。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后开始重新审视日本——这个与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友好交流

历史的邻国，同时也是与中国有着太多恩怨、曾经让中国民众血流成河、饱受凌辱的国家。改革开放初期，被封闭得太久的中国人渴望了解世界，特别是渴望了解邻国日本怎样从战败的废墟上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不仅成为东亚强国，还成为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当时《阿信》、《血疑》、《远山的呼唤》、《追捕》等日本的电视剧、电影在中国热映，中国观众在熟悉了高仓健、山口百慧、中野良子和栗原小卷等影星的同时，也渐渐了解了这个民族性格中的含蓄、刻苦、坚忍以及超强的凝聚力和集体意识。人们从报纸、杂志上刊登的那些介绍日本的高科技、新干线、企业文化、茶道和花道等的文章中，从开满樱花的上野公园、人流如织的浅草寺以及霓虹闪烁的新宿、银座等一幅幅照片上，看到了一个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民富足的国家形象以及彬彬有礼、勤勉、爱美的民族。

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日本家用电器在中国成为抢手货。当时因公出国都会得到一些大件和小件进口家用电器免税指标，可以去指定的外汇商品店用美元购买所需的电器产品。那时，我父亲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出国，我家第一代家用电器几乎都是“日本制造”，松下、三洋、山水这些品牌以无懈可击的高品质伴随了我们家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多个春秋。

九十年代初期，当我决定去日本留学便与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茨城县的筑波市与靠近日本海的富山市，我度过了将近四年的留学生活。学成回国后，又从事着日本问题研究。现在，我每天读的书大部分是日文的，关心和思考的问题是日本的，从事的课题也是关于日本的。日本已经成为我工作和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留学的富山县属于北陆地区，那里有着雄浑巍峨的立山连峰、湛蓝湛蓝的日本海、开满樱花的松川、穿行于市中心的有轨电

车……那里还有宽敞明亮的大学图书馆，有我打过工的中餐馆和法国餐厅，还有大学校园附近我曾栖身的“家”。记得刚到富山时，终日雨雪阴霾，每个夜晚伴随我的是身处异乡、举目无亲的孤独感以及对父母和北京的思念之情。在我熟悉了这片异乡的土地，硕士毕业即将回国的时候，在电车缓缓驶离富山车站的一刹那，泪水一下子模糊了我的双眼。我知道，这座城市的一草一木、那些日本友人，无一不牵动着我的心，富山已经成为我心中的第二故乡了。

作为九十年代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我是幸运的。留学时结识了太多善良而友好的日本人，他们的友情和关爱温暖了我漂泊的日子。在富山县日中友好协会长年义务工作的山田武代女士，像母亲般关心和呵护我，为了让我尽可能多地了解日本的山川、社会、文化，他们夫妇利用节假日带我游览京都、高山、草津温泉等名胜；我的导师三宝政美教授在授课的间隙，常拿出夫人准备的点心，泡上一壶乌龙茶，一边喝茶一边谈鲁迅、谈日本的习俗、谈中国的传统文化、谈“文革”和安保运动；我还结识了热爱唐诗、对中国人热情友好的泽井先生，新年的时候在他家打年糕，体验日本传统的新年习俗。他和一位叫西田的老人每周用一个晚上学习汉语，并坚持预习、复习，一遍遍练习发音，认真得如同两个小学生；还有一位叫燕升司的友人，回国后，每年我生日那天都能准时收到他寄来的生日贺卡或电子邮件，十多年从未间断。当我打开邮件的瞬间，那份来自异国的友情与惦念，总让我内心涌过一层暖流。日本这两个字和这些美好的回忆连在一起。每当想到日本时，这些往事就如同一朵朵鲜花盛开在记忆深处。

然而，在我心中，日本不仅仅意味着美丽的花朵，还意味着一道道深深的伤疤。这伤疤是刻在中国历史上一段屈辱的印记，是中华民族心灵上永远的伤痛。像我这样出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

代人，虽未经历过战争，但看到日本国旗，心中不免会联想到长达十四年的中华民族的抗战史，想到为挽救民族危亡而牺牲的英烈，想起南京城外被鲜血染红的河流，想起曾被“七三一”细菌部队称作“原木”并被惨无人道地用作人体实验，最终被夺去生命的同胞。

原本以为随着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的加深，中日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会掀过去，中日友好新的篇章会重新谱写。但伴随着两国经济、文化、人际交往的飞跃发展，互不信任和相互戒备的心理却不断加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日关系摩擦不断，两国媒体报道中对对方的负面新闻比比皆是，中日关系一度陷入复杂而令人困惑的局面。日本文部科学省审查通过了篡改历史、否定侵略的教科书；小泉纯一郎首相一次次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在东海问题、钓鱼岛问题上的分歧等消息经常会出现于《新闻联播》中，我们民族历史上那条尚未愈合的伤疤又一次次被揭开。中华民族不算久远的历史上曾有过的痛楚，以及近几年日本一些右翼政治家的言行，使得中国人似乎对日本这个民族有着太多的疑虑和担忧，日本军事力量的增强、海外派兵、修改和平宪法进程的推进，都让中国人产生深深的担忧：在一些不能正确对待历史，粉饰和篡改历史的日本政治家和媒体的推动下，有着强大经济实力又面临战后以来最长的经济低迷的日本会不会有一天重蹈历史覆辙？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2008年实施的第四次中日舆论调查表明，中国民众对日本感到“不亲近”和“很不亲近”者达58.6%，而感到“亲近”和“非常亲近”的仅占6.0%。我时常带着遗憾的心情浏览中日两国网络上那些强烈民族主义味道的文章和留言，有些极端的话语让我觉得这两个民族在战后一度达成和解后，两国民众的心灵却逐渐疏远并越走越远。这不能不让关心中日关系、渴望友好的民众感到深深的忧虑和遗憾。

不可否认，日本这个国家注定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在日本生活的经历、我的青春时代、我的异文化体验、我所从事的日本研究职业、我生命中那份沉甸甸的友情……无一不与这个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应该说我对这个国家是熟悉的，但我又不得不承认它的陌生与疏离。我无法将这个国家与中国近代史的屈辱割裂开来，日军铁蹄践踏下中华民族的呻吟声尚未随岁月的逝去而变得模糊。在日本我也曾遇到过否认南京大屠杀和否认“慰安妇”历史的政治家、普通民众，他们有着整套为当年的侵略进行辩解的说辞和理论。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每次去参拜靖国神社的新闻报道，都让我本来就脆弱的神经尤感痛楚。我时常陷入困惑，有时很难相信历史照片上手执军刀的日本军人与我认识的那些彬彬有礼、谦逊、内敛、感情细腻的日本人是同一个民族。对于日本、对于日本民族，我的感情似乎一直在花朵与伤疤之间徘徊游离，矛盾重重。

大多数填写中日舆论调查问卷的中国人，可能很少像我这样与日本有着这么密切的联系，也很少有人能体会我这种复杂矛盾的心态。我知道，大多数问卷的被调查者没有去过日本，在日常生活中也没有接触过日本人，他们不太了解当今日本社会的现状，不了解日本那些独特的传统文化，也很难说清楚日本的国民性。提到日本，他们更多联想到的是侵华日军、靖国神社、右翼势力……因此，他们会在这些选项上毫不犹豫地画上了对勾。

2000年的夏天，我的日本妈妈山田武代带着她的两个孙女来北京旅游。她的一个孙女和我女儿恰巧出生在同一年，而且，她们的名字里也都有一个“晴”字。在四天的时间里，我和女儿陪她们一起游览了北京很多地方。三个女孩子虽然有语言的隔阂，但芭比娃娃、日本动画片以及儿童的纯真善良使她们由陌生到熟悉。看着她们在一起玩儿时的快乐样子，听着她们清脆的笑声，我的内心充满

感动。真心希望她们长大以后，心灵上不再有横亘在中日两国历史上的阴影，她们会真心喜欢对方的国家，不像我这样一直在花朵和伤疤之间徘徊和矛盾。我也深深祈祷未来中国和日本的天空上不再有战争的阴霾，而是一片和平与友好的万里晴空。

现在，奉献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册关于日本的随笔集，是我在留学期间和回国后，对日本社会、文化、国民、历史、传统等进行的观察、体验以及思考。既然我已将研究日本作为今生的事业，那么，我对日本的感受、观察和思考也就不会停止。